

曾满祥生平

作者：(子)曾阳，(女)曾丹

2015年8月3日

父亲曾满祥，广东省东莞市石排墟石排乡曾屋新围村人，生于1937年1月13日，卒于2013年7月7日19时，享年77岁。

父亲排行第七，生于香港，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时，跟随家父、婶母及家兄弟、家姊先后回到广东老家。

父亲5岁时，在石排老家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则在惠阳县永平村就读，大伯父和二伯父（父亲的中哥和民哥）曾先后在该村小学任教。1944年2月至1947年7月，大伯父（父亲的中哥）在博罗县礪角乡新落成的上村小学任教，父亲跟随他从三年级读至五年级。1947年9月，父亲六年级时又回到石排。1948年，父亲在石龙中学读初中，1951年考上了中大附中高中。该校先合并后拆分，学校后相继更名为华南师院附中、华南师大附中。

1954年，父亲高考。为响应国家号召，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只身赴京，时年16岁。在校期间，父亲勤奋好学，以优异的成绩屡获奖学金。父亲光荣入党，入党介绍人是他的同学黄番娇（后来黄番娇说，在她的眼中，父亲是个勤奋好学，虚心识理的小弟弟）。1958年毕业时被母校留聘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语文教师。当时，北京市安排了一些高校的高材毕业生到中小学任教，这被称为“掺沙子”，父亲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后来，这些原本有可能

留在高校或其他“好单位”任职的高材生，日后基本上成了各中小学的骨干力量。

父亲刚当上中学教师的头几年，曾偶然在电影《青春之歌》中做过一次群众演员。在镜头里，他和他负责班级的学生排在一条蜿蜒的长队中。虽是镜头一闪而过，但仔细想想，那时缺乏摄像条件，父亲年轻时活动的影像大概也只有这一个吧，这个镜头应算珍贵。

家里一直小心收藏着父亲年轻时用的几个旧笔记本，其中的联笔小字写得密密麻麻的，秀气灵动，但一般人很难辨识。最老的那本里有父亲画的极精致的小插画。每幅画都是用一支很细的工笔毛笔悬腕画成。插画往往只有两寸照片大小，但图案精细，线条流畅，往往呈茸茸绿色，美丽而特别，这是因为父亲使用了一种特殊的颜料——变质发霉的蓝色钢笔水。变废为宝，是父亲勤俭一生的生活方式。而父亲满意的上乘之作，基本上是他年轻时用这种绿钢笔水画的，只可惜赶上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很多带有传统文化意味的插画（例如京剧里的小丑）都被他自己不得已打上了大叉子，现在看来真是无奈和遗憾。

1963年至1966年5月是中国大陆的“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政治运动）。“四清”期间，父亲带学生下乡。那段时间，除了参加大量的农业劳动，还积累了日后语文教学的一些难得的素材。比如，当地贫雇农说，村里的地主怎么对我们呢——“平时老吃韭菜，一年到头吃饺子”——乍听起来地主对贫雇农真好啊！可听了解释才明白，原来这句话的意思是，地主在平常的日子里，经常把那些长老了、嚼不动的韭菜给他们吃；等一年快到尽头儿了，熬到大

年三十儿晚上，他们才能吃上一顿饺子。这样生动的语言是书本上难于寻见的，从中可见劳动群众的智慧。

因为有下乡干农活儿的经验，多年后和家人住在师大附中校园里时，父亲在平房前面的空地上开了一小块地，种上了猪耳朵扁豆、丝瓜等。正像父亲授课时讲的“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他每年都要在春天播种之前，打好底肥。春暖花开时，架上挂满了一簇簇黄色、白色的、紫色的花。夏秋收获的时候，父亲总会送一些猪耳朵扁豆给教研组的同事。另外每逢春节，父亲也会带家人做很多广东年饺，给邻居和组里的同事们品尝。

1966年5月至1976年的“文革”期间，父亲一度改教政治课。那时的政治课纯粹是为政治服务的，并非正规的学科教学。此时的父亲仍然琢磨着教法。他的课学生比较喜欢，经验是授课一定要有事例。尽管这种教学思考还谈不上深入，但毕竟是在那个混乱年代背景下的一种经验总结，反映了父亲一生做事认真仔细和多思善思的特点。

80年代初，父亲回归语文教学，后来成为语文教研组组长。90年代，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并屡次荣获各种奖项。1991年3月，荣获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奖给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丹柯杯”。丹柯是神话故事中的勇士，掏出自己的心脏，凭借着燃烧的心脏在密林中开辟道路，带领族人前行寻找新生活。丹柯杯取自丹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之意，表达教师的奉献精神。而丹柯杯的造型也正是丹柯一手抚胸，一手高举心脏的姿态。父亲非常重视这项荣誉，一直珍藏在书柜里的很高的一格。

在教学上，父亲注重内容挖掘，激疑启智。上父亲的课，你会觉得整个教室空间都是属于他的，自己的思维紧跟着他走，多年如一日，每节课都是这样。父亲踏实治学，备课深入，授课生动，深受学生爱戴。曾出现代课时，本已经请假的学生带病返回课堂，听父亲讲鲁迅的情况。而父亲开设文字源流选修课时，因为报名听课学生众多，史无前例地在可容纳数百人的多功能厅开课，场面震撼。

父亲常年坚持作文和周记全批全改，这是所有工作中最辛苦的一项。他注重对学生思想的引导和培养，许多毕业生回忆起来，都感触当年不仅自己有写作技能的提高，更在思想方面获得了成长。

父亲从 80 年代初开始，先后自修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解决语文教学中关于汉字的种种困惑，涉及范围包括形声字、形似字、多音字、古今字、通假字、同源字、近义字、连绵词、合音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的褒贬、词类活用，以及古典诗词的平仄、押韵，等等。他针对中学生和中学语文教师经常遇到的难题，密切结合教材，撰写了《中学实用音韵知识》。本书被编入北京教育丛书，由北京教育出版社于 1996 年 10 月出版。北京教育丛书第一批收录的，基本上是北京市中小学教师中最优秀的教育科研成果；而父亲所著的这本书，更被有的人称为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在书架上立得住”的作品。

2004 年 5 月，父亲编著的《千个汉字为什么》由沈阳出版社出版。本汉字手册以实用为前提，紧密结合语文教学，特别是文言文教学，选取了 1042 个汉字，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知识，

从形、音、义、源方面加以讲解，使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本书多次加印。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的新华书店（北京核心区最大书店），很长时间都有这本书卖。《千个汉字为什么》一书，父亲是学着使用计算机写成的。由于父亲原来不会计算机，再加上要找到能够输入汉语拼音、国际音标等字符的办公软件（不是所有软件都具备全部录入功能），写作过程很是辛苦。还有就是这本书比上一本多了甲骨文、金文、篆文，每个字都如做软件字库般地手写，工作量极大。汉字的古音比现在的读音复杂许多，写书的时候，父亲总要轻声地发出字的读音，反复地体验和揣摩。

在父亲之后，将来北京中语界可能难有像父亲这样研究汉字的教师了，因为这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教师应掌握标准的普通话（父亲 16 岁来京，在北京生活时间较长；娶了北方妻子，妻子儿女能帮助纠正部分普通话的用法和发音，这些是便利条件）。第二，教师本人应是广东人，广东话发音有 9 个音，保留古音最完整，其他省份的方言难以比拟。第三，教师应同时掌握文字学（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北方人则难于掌握音韵学，平仄不能真正掌握，而且要学习上述三门学问是要下一番苦功夫的。第四，教师不仅要掌握汉语拼音，还应能准确运用国际音标，包括国际音标的非常用的标记方法，因为汉字古音用汉语拼音是远远不够的。

早在 1985 年 12 月，父亲还编著出版了《广东人学普通话》，这是一本粤语发音与普通话发音对照的字典形态的书籍，因其实用性、全面性、准确性，同其他两本书一样，都被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收藏。回想当年父亲写这一本书是住平房的时候，一个半间的小屋子里只能

摆放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床。那张桌子上总是摆满了书稿，除了整页的稿纸，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剪成一块块、一条条的细小稿纸。因为那时的条件是手写，手写错一处，父亲就要用剪了的“补丁”粘上，保证稿件整洁。母亲总是帮助父亲剪贴，那些细碎的，待用的“补丁”和边角料经常铺满桌面。父亲不让家人动桌上的稿子和补丁，他怕别人帮助整理，自己反而找不到要找的东西了。

80年代，父亲还与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和本校同行一起，编写过北师大几所附属中学使用的语文实验教材。教学中，这个语文实验教材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是交替使用的。

父亲是北京市基础教育中心的兼职教研员，他在北京市中语界有一定的影响，宣武区（师大附中校址所在行政区，后来宣武区与西城区合并）之外的许多教研员、教师都知晓他的名字。父亲所带的徒弟在业务方面多有出息，有的徒弟后来还成为北京市名师、特级教师。

父亲与学生的关系融洽，每届教学班的新年联欢会他都主动参加。父亲参加联欢从不空手，一是带着大包零食，二是带着学生“姓名谜语”这个保留节目。“姓名谜语”是把学生的姓名编成谜语让大家猜，编这样的谜语很有讲究，既要合一般编谜要求，需要学生巧思善解，又要生动有趣，为节日增添喜庆气氛。

父亲作为语文教研组长，也很注意与同事关系的协调。父亲的业务水平显然是教研组中最高的，但组里的老师们都想在高中教课，父亲为同事上高中任教提供方便，自己较长时期留守在初中教学，这在绝大多数学校及教研组是鲜有先例的。父亲在高中教学的几年，显示

了他教学的高水准。一次父亲（也许是学校）请北京某名师来自己的教学班做示范课，相较之下，父亲常态教学的质量水平远高出这节（在学生看来）所谓的名师示范课。等下节语文课父亲重回讲台，班里学生都十分高兴，因为曾老师又回来了！

父亲是属于那类一上讲台就特别精神的老师，即便是上课前他还感觉十分疲劳。退休前，父亲积劳成疾，曾几次出现心脏病发作，其中有两次晕倒在课堂上。2000年，一向为工作鞠躬尽瘁的父亲被查出肺癌。从患病到离世的13年半中，父亲与病魔长期斗争，显现出了惊人的意志力和乐观精神。尤其是服用靶向治疗药物后常年口腔溃疡，每每看着他为了摄取足够的营养对抗癌症，忍受疼痛努力吃饭的一幕，都让人既揪心，又难过，同时十分敬佩。

父亲对自己很节俭，对其他人却十分慷慨，工作后常年资助有需要的朋友、同事、学生，甚至有的人不再需要资助后还介绍其他需要资助人给父亲认识。而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十年动乱期间，父亲远在广州的亲人和北京的姻亲也靠着父亲微薄的收入撑过了最苦的日子。正是因为这种人格魅力，父亲在服用昂贵的靶向治疗药物时，亲人、同事、同学、朋友、学生纷纷解囊赞助，最终数额竟然超过了药费和后来伽玛刀手术费总额。

1964年，经同事介绍，与母亲（张清芳）成婚，婚后育有一子（曾阳）一女（曾丹），父亲常常笑言，一子一女，合起来就是“好”。年轻时，母亲身体不好，工作地点也远，父亲承担了更多的家庭压力；晚

年父亲常跑医院，看病拿药，化疗手术，母亲尽心照顾，也是父亲常常感念的事情。他们结婚 45 年，感情和美，互相体谅，极少发生争执。

退休以后，父亲与母亲生活充实，他们经常一起逛公园，或在小区赏花。有时候下雪，他们一同赏雪和摄影。父亲喜欢照相，他拍摄家人、拍摄花草、拍摄风景，计算机里存储了大量的照片。父亲还喜欢通过光明网进行阅读，这是他年轻时就养成的习惯。原来上班时，他除了看自己订阅的报纸，每天还要在学校传达室浏览主要报刊，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父亲一辈子注意坚持锻炼身体，直到晚年，仍每天做他自己发明的体操和保健操。由于身体底子打得好，2007 年，70 岁的他仍能承受第二次开胸手术，且术后较快恢复。

2007 年，父亲曾在第二次查出患癌后总结自己的一生：第一，娶了一位好妻子；第二，养育了一子一女，儿女孝顺且自立；第三，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